

王尧

林建法 主编

王尧 编选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

一九四九—二〇〇九

卷三

◆ 苏州大学出版社

王尧 林建法 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

一九四九—二〇〇九

卷 三

王尧 编选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全6卷 / 王尧，林建法主编；郭冰茹等编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672-0081-4

I. ①中… II. ①王… ②林… ③郭…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6349 号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一九四九—二〇〇九

卷三

王 尧 林建法 主编

王 尧 编选

策划 沈海牧 朱绍昌 倪浩文

责任编辑 沈海牧 倪浩文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215006)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胡桥镇 邮编：212313)

开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200.25(共六卷) 字数 3 79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0081-4 定价：500.00 元(全六卷)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目 录

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

的反动理论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1)
还要努力作战

——评《虹南作战史》中的洪雷生形象 方泽生(10)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批判周扬一伙的“写中间人物”谬论 宇文平(15)

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 苏习(20)

坚持用阶级观点研究《红楼梦》 孙文光(24)

评晋剧《三上桃峰》 初澜(31)

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

——评长篇小说《艳阳天》 初澜(37)

京剧革命十年 初澜(42)

评湘剧《园丁之歌》 湘晖(49)

精心的再创作,可喜的新收获

——试谈彩色影片《闪闪的红星》的改编成就 姚青新(55)

社会主义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部 辛文彤(62)

走出“彼得堡”

——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 任犊(68)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岩梁(73)

从《初春的早晨》到《盛大的节日》

——评“四人帮”鼓吹“写走资派”的“理论”和“实践” 王一纲(78)

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茅盾(97)

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工作	周 柯(104)
报告文学的新开拓	
——读《哥德巴赫猜想》	张 炯(111)
艺术家的责任和勇气	
——从《班主任》谈起	西 来 蔡 葵(117)
从生活出发	
——评话剧《丹心谱》	朱 塞(124)
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	林默涵(134)
漫谈文艺创作	茅 盾(145)
自有人民写春秋	童怀周(157)
旧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	
——革命京剧《逼上梁山》是怎样创作的?	齐燕铭(167)
《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	陈荒煤(180)
谈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任务	周 扬(183)
美学的丑剧	
——评姚文元的《美学笔记》	李泽厚(189)
驳“文艺黑线”论	张光年(202)
《于无声处》三人谈	曹 禹 赵 寻 宗福先(207)
篇短意深 气象一新	陈荒煤(212)
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	巴 金(235)
花草辩	
——从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联想到的	王云缦 梁晓声(237)
诗人的青春	
——喜读艾青近作	晓 雪(242)
关于总结三十年文艺问题	陈荒煤(265)
新的课题	
——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	公 刘(282)
建国三十年新诗漫评	杨匡汉 杨匡满(287)
为文艺正名	
——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	《上海文学》评论员(301)
短篇小说的结构	唐 弼(308)
“歌德”与“缺德”	李 剑(316)

《创业史》艺术谈

——在“对立”中刻画人物	阎 纲(319)
论刘白羽散文的艺术风格	吴周文(326)
美不会毁灭	
——杨朔的散文艺术	吴欢章(340)
论“歌德派”	严 秀(351)
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	周 扬(363)
编后记	(386)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

三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总结五四运动以来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时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正是经过那二十年的斗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运动的划时代文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十年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种文化经历了更加激烈曲折的斗争，而考验的结果，则是进一步证明：只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唯一正确的路线。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顽固地推行了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把鼓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和作品，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在周扬看来，西方资产阶级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不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高峰”，站在“高峰”上的有这个“大师”，那个“斯基”，“说都说不完”。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文艺革命，只要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为“奋斗目标”，来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就行。几十年来，他发表了无数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作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毒箭。对于这些反动言论，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把资产阶级文艺当作“奋斗目标”还是搞无产阶级文艺革命？

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是什么？它们都是为发展

资本主义、建立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企图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制造舆论的。资产阶级在文艺复兴时期刚刚走上政治舞台，在启蒙运动时期进行了向封建阶级夺取政权和逐步确立资本主义统治，而到了产生批判现实主义文艺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充分暴露出它固有的矛盾，无产阶级开始以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一部从文艺复兴经启蒙运动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不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从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吗？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彻底批判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体系，彻底批判一切为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服务的思想体系，而决不能把资产阶级文艺当作模范或“目标”。那样做，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能把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当作“奋斗目标”吗？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竭力鼓吹“人文主义”即“人道主义”，据说是只有到他们才“发现”和“肯定”了“人”。但是，封建阶级也是一种“人”，它却不讲“人道”而讲“神道”。那个“神”，正是神化了的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用“人道”反对封建阶级的“神道”，这种“人”，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自己。至于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亿万劳动人民，则既没有被“发现”，更不会被“肯定”。“人文主义”者宣扬现世幸福高于一切，其实是用资产阶级公开的纵欲主义，反对封建阶级的禁欲主义即不公开的纵欲主义。他们高唱“我的思想只以我自己为唯一的目标”，更是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疯狂的占有欲都当成是“自然”赋予的“普遍人性”。把这一套统统“复兴”起来，哪里还有劳动人民的地位！哪里还有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

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能把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当作“奋斗目标”吗？周扬到处鼓吹“用科学之真理启群众之冥蒙”，完全反映了资产阶级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把群众当作“群氓”的反动观点。真理是有阶级性的。什么是“科学之真理”？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将使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真正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从哪里来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从群众中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向劳动人民进行反复的宣传和教育，当这个“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到群众中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遵循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

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但那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所谓“启蒙”，不仅摆出恩赐者面孔，而且是用“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资产阶级谎言欺骗群众，为建立或巩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所谓“启蒙”，对无产阶级来说，其实是“蒙蔽”！以这种文艺为“目标”，就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反革命舆论。请看：周扬文艺黑线在刘少奇的授意下，为这个叛徒树碑立传而炮制的反动影片《燎原》里，不就有个叫雷焕觉的家伙吗？“雷焕觉”者，“来唤觉”也。这个工贼是以“救世主”的身份“来唤醒”群众的“觉悟”的。多年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蒙蔽、镇压工农群众，只准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不准工农群众起来革命！

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能把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当作“奋斗目标”吗？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是为了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作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但不敢否定其剥削本质，不敢触及资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专政，是梦想给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开药方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某些批判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超出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要如此起劲地吹捧批判现实主义，就因为他们也是没落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可以借此维护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周扬一伙从苏修叛徒集团那里把这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引进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后，便派生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等变种，公开煽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勇于揭露生活真实”，“揭露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用以瓦解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如果我们要从思想文化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必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实，即使在当时，资产阶级提出“文艺复兴”的口号，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资产阶级是真的要恢复古希腊罗马奴隶主文化吗？不是的。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资产阶级当时的“理想王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绝不是要向奴隶制社会倒退。它所以要在向封建统治发起进攻中打起“文艺复兴”的旗号，除了用以激发自己的战斗热情之外，主要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革命的狭隘内容，以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处于初兴时期提出的“文艺复兴”，是为着实现多少带有前进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即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一种旧的剥削制度，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周扬之流要把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作为“奋斗目标”，却完全是代表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适应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需要，即通过“复兴”资产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来复辟旧政治、旧经济，复辟旧的剥削制度，使

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倒退，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沦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反动阶级对于历史规律的抗拒，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恩格斯说过：“这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格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却预言式地提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如果说，还在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行进过程中，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就已经毫不妥协地向资产阶级提出了“财产公有”的挑战；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今天，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今天，周扬之流重抄资产阶级老皇历，妄图为资本主义招魂，就如同妄图要地球倒转那样可恶而又可笑！

驳文化上的卖国主义

周扬在吹捧资产阶级文艺时，特地说明：“外国的朋友们很希望看到东方的文艺复兴。”叛徒、特务周扬的“外国朋友”是些什么人呢？只能是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这些人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会有什么“希望”呢？“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周扬就是忠实执行帝国主义“预言家们”的反革命“希望”的一个卖国贼。

为了推行这条卖国主义文艺路线，周扬制造了种种反革命舆论：

所谓“完全一致”论。

周扬认为：初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是“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因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资产阶级文艺“对人类作了巨大的贡献”。而到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虽已腐朽没落，但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却据说是已经背叛了本阶级的“浪子”，“不赞成资本主义”，因而这种文艺又成了“全体文明人类的骄傲”。干脆一句话：资产阶级的全部文艺都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

这是文化上彻头彻尾的阶级投降主义。

诚然，资产阶级一直企图把自己打扮成“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但是，即使当资产阶级开始向封建阶级发起进攻的时候，也丝毫没有停止过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它的向封建阶级发起进攻，正是为了夺取统治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力，因此，一旦政权到手，往往立即同封建阶级联合起来向要求继续革命的劳动人民

实行残酷的镇压。在近代世界史上，留给我们的这些血的教训难道还嫌少吗？

毛主席有一个十分深刻的概括：“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这句一针见血的话，足以打破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所散布的什么“全民文艺”、“全人类文艺”的谎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一切，就是用它的剥削本性改造过的一切。被周扬之流引为“骄傲”的全部资产阶级文化，都是他们在残酷地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基础上造成，并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文艺是这样，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只是，前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还处于自己的所谓“黄金时代”，因而出现了像笛福笔下的鲁滨孙这样的所谓“征服者”即野心勃勃的殖民主义者的形象；而在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于是出现了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以及一批专写所谓“多余的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难道他们真的“不赞成资本主义”吗？不！他们是竭力企图挽救本阶级腐朽反动统治的崩溃和灭亡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的维护者，当作劳动人民的代言人来歌颂，而必须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这些作品，从资产阶级散布的种种谎言中解放出来，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部上层建筑。

所谓“不可超越”论。

周扬吹捧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现实主义“不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高峰”，下令不准也“不必超过”；岂但不能“超过”，连“比”也没有资格，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先跟在西方资产阶级屁股后爬行“几百年”才能与之相“比”哩！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承认世界上的具体事物存在什么不可超越的极限。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都曾多次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宣布他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是什么“不可超越”的“终极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却早已彻底戳穿了他们用来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这种谎言。周扬的“不可超越”论，实质上无非是在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超越”。

在人类历史上，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而资产阶级的全部文化都只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哪里经得起一比呢？比一比典型人物的创造吧！翻开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全部作品，描写的、歌颂的、美化的都是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形象，偶尔出现的几个工农群众形象，不是被歪曲成为暴徒，就是被丑化成为奴才。形形色色的剥削者、吸血鬼，却被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公，在舞台、银幕、小说、诗歌等各个场合飞扬跋扈，耀武扬威。在这里，历史的真相、历史进程的本质完全被颠倒了。周扬对这一点当然是死不承认的。他认为资产阶级作家不仅创造了无数“活生生的典型人物”，而且还创造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新

人”典型。他一再鼓吹俄国资产阶级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本叫《怎么办?》的小说里,不但描绘了妙不可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图画”,而且还创造了一群这种“新人”的典型。这群“新人”的人物之一,名叫薇拉。“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明明是丑恶的“利己主义”,却偏要虚伪地戴上一顶“合理的”帽子;明明是一个工场女资本家,却偏要假心假意地让工人都来做“老板”,搞所谓“文明剥削”。据薇拉的第一个丈夫说,这一套他早在“美国见过啦”。其实,周扬鼓吹的这种让工人都来当老板的“新人”,我们上海工人阶级在解放前就领教过了。他们那一套所谓的“文明剥削”,其实不过是大老板从残菜剩饭中拿出一点点来,收买工贼、欺骗工人的一种手段,同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所鼓吹的“福利国家”一样,都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只要把资本主义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加以美化,立刻就成为周扬心目中“未来社会主义”的“新人”典型,这就是所谓“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可超越的“高峰”!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早已证明: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光辉典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江青同志用心血培育出来的革命样板戏,才真正是一切资产阶级文艺所无法比拟的。面对着李玉和、杨子荣、方海珍、郭建光、吴清华、洪常青等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群像,回头再看看资产阶级文学艺术作品中那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形象,岂不显得极其藐小!周扬胆颤(战)心惊地说:“事事都要超过就会出问题。”好一个“就会出问题”!这不是一语泄漏了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伟大胜利面前的恐惧心理吗?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注意,是“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包括它们的资本主义文化!这就是对于周扬“不可超越”论的最彻底的批驳和最有力的回答!

所谓“全盘西化”论。

周扬鼓吹要“伸手向着西洋遗产”,要“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东西保留在今天的文艺中”。一要“旧”,二要“系统”,三要“保留”,这难道还不算“全盘西化”?他还胡说什么由于我国“艺术各部门技术传统的薄弱”,“西洋技巧”“较之中国固有的旧的技巧,当然是更进步,更科学得多的”,因此,“多吸收一点总是好的,多一分有一分好处”,真是数典忘祖,无耻之尤。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么?一丝一毫也没有了,有的是一副向西方资产阶级摇尾乞怜的奴才相!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勤劳而勇敢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有高度文化的民

族。中国早从“五四”以来，就产生了在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鲁迅为代表的新的文化生力军和新的文化方向，而宣告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的终结。

今天，我们在建立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文化。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古的和洋的艺术，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表现，是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的东西；至于其中少数作品的艺术形式的某些方面，也是需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进行批判和改造，才能推陈出新，使它为创造无产阶级文艺服务。“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要用，就得批判；不批判，就不能为我所用，更谈不上推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江青同志率领革命文艺工作者创造的革命样板戏，是实践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伟大方针的光辉典范，在关于如何对待和处理文化遗产的实践问题上，正在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周扬眼里，却是只见“洋”不见“中”，只见“古”不见“今”，只看到西方的资产阶级，看不到东方的无产阶级。如果照周扬那样让资产阶级文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只能是对刘少奇一伙实行卖国主义起到“多一分有一分好处”的反动作用。

毛主席深刻指出：“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周扬从鼓吹“完全一致”到“不可超越”，从“不可超越”到“全盘西化”，就这样一步步地跟着刘少奇“爬”到了叛党卖国的道路上去！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文化上都极度软弱、落后，而作为资产阶级右翼的买办资产阶级，更是事事仰赖西方资产阶级，专干出卖祖国的罪恶勾当。周扬就是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实行卖国主义的一个代表，当然不是唯一的代表。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胡适就是周扬的先行者。胡适之流说：月亮也是美国的好。周扬说：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是最“进步”、最“科学”（的），“卓越”得我们只能望尘莫及。两人一先一后，可称得上难兄难弟。他们之间有没有不同呢？有，胡适是专营美国货的文化买办，周扬则是兼营杂牌货的文化买办。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当前，文艺战线的斗、批、改群众运动要深入进行下去，就必须破掉周扬这套吹捧资产阶级文艺的反动理论。

必须解决一个如何正确认识西方古典文艺的问题。所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都算是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如同帝国主

义、社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样，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正在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但长期以来，国内外修正主义者却把资产阶级古典文艺和资产阶级现代派文艺对立起来，仿佛古典文艺不是资产阶级文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全民文艺”，名声都是给现代派搞坏的。这是一个欺骗。资产阶级古典文艺和现代派文艺，在艺术形式上是有某些区别的，前者对我们来说，可以起一定的借鉴作用，而后者则根本毫无一点可取之处；但是，就其阶级本质来看，两者完全是一致的，后者是前者的恶性发展，是资产阶级在二十世纪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可逃脱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必然结果。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方式，一种是明目张胆地照搬现代派文艺，另一种则是利用所谓古典文艺。这不仅因为资产阶级在古典文艺中所“追求”的目标，正是它今天已经失去而在千方百计“复辟”的天堂，而且还因为社会上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对这种古典东西所代表的阶级本质往往认识不足，极易被俘虏过去。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批判。请看，只要我们稍微触动一下资产阶级古典文艺的“大师”们，苏修叛徒集团就暴跳如雷，这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批判的必要性。把资产阶级古典文艺“大师”、“斯基”敬若神明的苏修文坛，现在不仅已经充塞着爵士乐、扭摆舞以及西方现代派的一切垃圾货，而且还成为风靡一时的最时髦的东西哩！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不但要发展“现代派”腐朽的东西为他们服务，而且也要借这些“古典”死人的名声来专无产阶级的政，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他们同时使用这文化上的反革命的两手。他们中间有时也发生一些争吵，甚至吵得昏天黑地，有的主张搞现代派，有的认为现代派要不得，有的叫喊老沙皇野蛮的侵略思想如何“圣洁”，有的则吹捧美帝国主义的堕落文化如何“文明”，这不过是究竟哪一种刀子屠杀人民更好些之争，本质上是一样的。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很能教育人们的。

长期以来，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而言必称“大师”、“斯基”的周扬之流无论在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方面都散布了大量毒素。我们要来一个思想大扫除，大灭西方资产阶级威风，大长中国无产阶级志气，推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同时又是必须切实抓紧并且进行到底的革命任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京剧革命、芭蕾舞革命、交响音乐革命中产生的一批革命样板戏，正在发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鼓舞着我们在各个文艺领域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进行革命和创造。周扬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垮台了。但是，思想文化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旧思想、旧文化还会顽强地挣扎。今后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新毒草，可以是“阿飞舞”之类的资产阶级现代派，也可以是搬出这种或那

种资产阶级古典文艺，它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都起着破坏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继续战斗，必须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革命大批判运动，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文艺路线，批判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资产阶级“汉子”，批判他们所吹捧的“大师”、“斯基”和从孔子到胡适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并在革命大批判中，使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得到锻炼和改造。我们希望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都能重视和参加这场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在内的全面专政而斗争到底。让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积极战斗，迎接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吧！

——原载《红旗》1970年4月第4期

方泽生

还要努力作战

——评《虹南作战史》中的洪雷生形象

我们以十分兴奋的心情,读完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全过程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贫下中农以如此高昂的革命热情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而走在这个行列前头的,是他们的代表洪雷生。

洪雷生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群众领袖人物的一个艺术典型。这个英雄形象所以引人注目,在于人物形象里如作者所说的“注入了某些新的因素”,即从社会主义社会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塑造这个英雄形象,表现出了时代的风貌,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斗争的本质,概括了从贫下中农中间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特点。

小说反映的背景,基本上取材于上海市郊新泾区虹南乡合作化过程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高度赞扬了虹南乡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了按语。按语最后说:“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这两句话,概括了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还要努力作战”这一战斗号召,极大地鼓舞着广大贫下中农不断革命、继续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种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精神,也可以说是洪雷生身上最突出的无产阶级品质。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洪雷生从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胜利,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去夺取新的胜利。互助组刚巩固,他就要转社,非入不可,“我就是这句话!”初级社办好,机会主义者忙得“七处生烟,八处冒火”一团糟,想“坚决收缩”的时候,他却带着贫下中农坚决向高级社迈进,“毛主席给我们指的路,谁也拦不住!”战胜了天灾,战胜了“人祸”——机会主义分子浦春华的污蔑,富农的破坏,富裕中农的干扰之后,他一刻也不停,“第二天就带着青年队去支援了宝北乡的那个高级社”。他所

做的一切看来似乎都很平凡：拆廓，办社，竞赛，辩论，筑渠……然而他在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合作化的康庄大道上，一步一个脚印，步伐是那么豪迈，那么坚定。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化为洪雷生形象的血肉，使他的性格变得突出而动人了。

洪雷生英雄性格的第一个特点是“硬”。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脾气也硬得很”，“宁可饿一顿肚皮，不肯受一点气”。然而，这样概括还不全面，这只是青少年时代的洪雷生的性格特点。在党的培养下，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入了党，他的“硬”的性格就有了新的阶级内容，即革命的硬骨头精神，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办社的时候，洪雷生不同意那张排斥贫下中农的名单，高曲文用浦春华的名义压他，他毫不妥协，“将手往腰里一叉，威风凛凛地说：‘不管是谁决定的，这个名单我就是不同意。……’”他“硬”得很。在与天灾人祸的一场大斗争中，浦春华直接跳了出来，给他扣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污蔑虹南村高级社是“三类社”，企图强迫洪雷生就范，洪雷生毫不动摇，一硬到底，“当一天共产党员就要同错误思想顶一天”，“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合作化道路，哪怕是钢刀搁在头颈上，也不回头！哪怕是刮十二级台风，我也不动摇！”有时他硬得似乎不近“人情”：菜贩子请他吃油饼，他正眼也不看，“大口大口地吃着麦粉饼”；菜贩子趁他不在，用高价把集体的菜弄走了，他还要追回来，退款，要他们写检查，宁可合作社减少一笔收入。他“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这样“硬”到底，就把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机会主义的邪气压下去了，调动了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洪雷生并不是一跳八丈高的“莽张飞”式的人物，他“谦虚谨慎”得很，斗争需要他“软”的时候，他又“软”得很有分寸。富裕中农牛虎生一次次向他挑战，给合作社添麻烦的时候，他偏不理睬那一套，把火压下去，自觉地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按照党的政策去团结他，教育他，改造他，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连牛虎生也不能不有所触动。这里所说的“硬”、“软”结合，就是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标志着洪雷生英雄性格的成熟。

洪雷生英雄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用脑子分析”。他想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富贵发财的“美梦”，而是“合作化运动发展方向”。多思，使他近乎“老成”，看来似乎缺少一般青年人的热闹劲儿。但这正是洪雷生英雄性格趋向成熟的另一重要标志。他补着花袋，“脑子里想的却是全虹南村，却是虹南村今后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光明景象，却是想到了全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景象”；肩上挑着粪，对付富裕中农的“下马威”，心里想的却是“无产阶级要团结、改造、教育中间派”的历史使命。越想，“心胸宽了”，方向明了；越想，看问题比别人深，进步比别人快。这也许就是浦春华所讥讽的“幻想太多”吧，然而他常常把思想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所以想到点子上，符合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进程的规律；再加上他的